

学术版

中国佛教通史

第二卷

赖永海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国家“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重大成果

学术版

中国佛教通史

第二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通史. 第二卷/赖永海主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214 - 06479 - 0

I . ①中… II . ①赖… III . ①佛教史—中国

IV . B9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051 号

书 名 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
主 编 赖永海
策划编辑 府建明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吴赵铎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270 插页 75
字 数 7 0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6479 - 0
定 价 900.00 元(精装全套)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南北朝佛教与王朝世族 1

第一节 南北朝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1

- 一、南朝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1
- 二、北朝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6

第二节 南朝帝王的佛教信仰及其佛教政策 9

一、刘宋诸帝与佛教 9

- 1. 武帝刘裕与佛教 9
- 2. 文帝刘义隆与佛教 11
- 3. 孝武帝刘骏与佛教 18
- 4. 明帝刘彧与佛教 21
- 5. 顺帝刘准与佛教 23
- 6. 刘宋诸王与佛教 23

二、南齐诸帝与佛教 25

- 1. 高帝萧道成与佛教 26
- 2. 武帝萧赜与佛教 27
- 3. 东昏侯萧宝卷与佛教 28
- 4. 南齐诸王与佛教 29

三、梁代诸帝与佛教 37

- 1. 武帝萧衍与佛教 37

| | |
|---------------------|----|
| 2. 简文帝萧纲与佛教 | 38 |
| 3. 元帝萧绎与佛教 | 41 |
| 4. 昭明太子与佛教 | 45 |
| 5. 梁代诸王与佛教 | 47 |
| 四、陈代诸帝与佛教 | 49 |
| 1. 武帝陈霸先与佛教 | 50 |
| 2. 文帝陈蒨与佛教 | 51 |
| 3. 宣帝陈顼与佛教 | 53 |
| 4. 后主陈叔宝与佛教 | 54 |
| 5. 陈代诸王与佛教 | 57 |
| 第三节 北朝帝王的佛教信仰及其佛教政策 | 59 |
| 一、北魏诸帝与佛教 | 59 |
| 1. 道武帝拓跋珪与佛教 | 59 |
| 2. 明元帝拓跋嗣与佛教 | 61 |
| 3. 太武帝拓跋焘与佛教 | 62 |
| 4. 文成帝拓跋濬与佛教 | 66 |
| 5. 献文帝拓跋弘与佛教 | 69 |
| 6. 孝文帝元宏与佛教 | 70 |
| 7. 宣武帝元恪与佛教 | 74 |
| 8. 孝明帝元诩与佛教 | 76 |
| 9. 孝庄帝元子攸与佛教 | 78 |
| 10. 北魏诸王与佛教 | 79 |
| 二、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与佛教 | 83 |
| 三、北齐诸帝与佛教 | 85 |
| 1. 文宣帝高洋与佛教 | 85 |
| 2. 武成帝高湛与佛教 | 90 |
| 3. 后主高纬与佛教 | 92 |
| 4. 北齐诸王与佛教 | 93 |
| 四、西魏诸帝与佛教 | 95 |
| 1. 文帝元宝炬与佛教 | 95 |
| 2. 恭帝元廓与佛教 | 97 |
| 五、北周诸帝与佛教 | 99 |
| 1. 明帝宇文毓与佛教 | 99 |

| | |
|------------------------|------------|
| 2. 武帝宇文邕与佛教 | 101 |
| 第四节 梁武帝其人及其佛学思想 | 103 |
| 一、梁武帝的佛教信仰及其奉佛活动 | 103 |
| 1. 梁武帝的佛教信仰 | 104 |
| 2. 梁武帝的奉佛活动 | 110 |
| 二、“真神论”与灵魂说 | 126 |
| 三、梁武帝对中国佛教发展方向之影响 | 143 |
| 第五节 南朝世族与佛教 | 148 |
| 一、琅琊王氏与佛教 | 149 |
| 二、陈郡谢氏与佛教 | 155 |
| 三、吴国张氏与佛教 | 164 |
| 四、庐江何氏与佛教 | 170 |
| 五、吴郡陆氏与佛教 | 172 |
| 六、汝南周氏与佛教 | 174 |
| 第二章 西行求法高僧及其贡献 | 180 |
| 第一节 两晋西行求法高僧 | 180 |
| 一、竺法护、康法朗 | 181 |
| 二、于法兰、于道邃、竺佛念 | 184 |
| 三、慧常、进行、慧辩、昙猛 | 187 |
| 四、法领、法净、慧叡 | 190 |
| 第二节 法显大师西行及其贡献 | 195 |
| 一、法显大师生平 | 195 |
| 二、法显大师西行的过程 | 202 |
| 1. 由长安西行至沙河 | 203 |
| 2. 西域记游 | 203 |
| 3. 天竺记游 | 204 |
| 4. 师子国记游 | 209 |
| 5. 海路归国 | 209 |
| 三、法显大师对中国佛教义学、律学的贡献 | 210 |
| 第三节 法显的同行者 | 213 |
| 一、慧景、道整、慧应、慧嵬 | 213 |
| 二、智严、宝云 | 217 |

| | |
|----------------------|-----|
| 三、慧简、僧绍、僧景、慧达 | 224 |
| 第四节 南北朝时期的西行求法高僧 | 227 |
| 一、智猛、道嵩、昙纂等 | 227 |
| 二、昙无竭、僧猛、昙朗 | 234 |
| 三、竺法维、释僧表 | 236 |
| 四、法盛、慧览 | 239 |
| 五、道普、法献 | 241 |
| 六、道药、宋云、惠生、法力 | 243 |
| 第三章 大乘般若学的传入与流行 | 252 |
| 第一节 鸠摩罗什与两晋般若经典的传译 | 252 |
| 一、《道行般若经》、《放光般若经》的翻译 | 252 |
| 二、鸠摩罗什其人 | 258 |
| 三、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 | 260 |
| 四、鸠摩罗什的著述 | 265 |
| 五、鸠摩罗什的佛学思想 | 265 |
| 1. 空与中道 | 265 |
| 2. 智慧与慈悲 | 268 |
| 3. 法身与净土 | 271 |
| 4. 大乘与小乘 | 273 |
| 六、罗什的弟子 | 278 |
| 七、僧叡生平及其佛学思想 | 279 |
| 1. 般若学 | 280 |
| 2. 般若与禅定 | 283 |
| 3. 般若与佛性 | 284 |
| 八、鸠摩罗什与中国佛教 | 289 |
| 第二节 般若经典的基本内容与主要思想 | 290 |
| 一、《摩诃般若经》的基本内容与主要思想 | 290 |
| 1. 大乘与小乘 | 291 |
| 2. 一切皆空 | 294 |
| 3. 六度 | 300 |
| 二、《金刚经》的基本内容与主要思想 | 304 |

| | |
|----------------------|-----|
| 第三节 两晋时期的般若学者与般若学流派 | 309 |
| 一、两晋时期的般若学者 | 309 |
| 二、六家七宗 | 311 |
| 1. 本无宗 | 312 |
| 2. 本无异宗 | 314 |
| 3. 即色宗 | 315 |
| 4. 心无宗 | 320 |
| 5. 缘会宗 | 322 |
| 6. 识含宗 | 322 |
| 7. 幻化宗 | 323 |
| 第四节 僧肇及其佛学 | 324 |
| 一、僧肇的生平 | 324 |
| 二、僧肇的著述 | 325 |
| 三、僧肇的佛学 | 326 |
| 1. 物不迁论 | 326 |
| 2. 不真空论 | 329 |
| 3. 般若无知论 | 332 |
| 4. 涅槃无名论 | 341 |
| 四、僧肇与中国佛学 | 347 |
| 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的佛典翻译 | 351 |
| 第一节 刘宋时期的佛典翻译 | 352 |
| 一、竺难提、沮渠京声的佛典翻译 | 354 |
| 二、佛驮什、伊叶波罗的佛典翻译 | 359 |
| 三、求那跋摩、僧伽跋摩的佛典翻译 | 360 |
| 四、沙门曇良耶舍、沙门昙摩蜜多的佛典翻译 | 370 |
| 五、求那跋陀罗的佛典翻译 | 379 |
| 六、沙门功德直、释道严等的佛典翻译 | 389 |
| 第二节 萧齐时期的佛典翻译 | 392 |
| 一、昙摩伽陀耶舍、摩诃乘的佛典翻译 | 392 |
| 二、僧伽跋陀罗的佛典翻译 | 393 |
| 三、达摩摩提、求那毗地的佛典翻译 | 395 |
| 四、释昙景、释法化的佛典翻译 | 399 |

第三节 梁、陈时期的佛典翻译 399

一、曼陀罗的佛典翻译 400

二、僧伽婆罗的佛典翻译 402

三、王子月婆首那、沙门须菩提的佛典翻译 405

第四节 真谛的佛典翻译 407

一、真谛的生平及其译经活动 408

1. 真谛所学及来华经过 408

2. 富春译场 410

3. 重归建康设译场 413

4. 颠沛流离遇萧勃 413

5. 由豫章至晋安设译场 415

6. 至梁安郡设置译场 418

7. 复返广州设译场 423

二、真谛翻译的经论以及著述 425

1. 真谛翻译经论以及著述总数 425

2. 《佛性论》 428

3. 《遗教经论》 430

4. 《决定藏论》、《无相思尘论》、《解捲论》 434

5. 《无相论》 435

6. 苏公望补充的八种 437

三、真谛译籍、注疏编年 440

第五节 北魏、东魏的佛典翻译 441

一、释昙曜、沙门吉迦夜、昙摩流支的佛典翻译 442

二、菩提流支的佛典翻译 444

三、勒那摩提的佛典翻译 454

四、佛陀扇多的佛典翻译 459

五、瞿昙般若流支的佛典翻译 462

六、毗目智仙的佛典翻译 466

七、释法场、达摩菩提的佛典翻译 470

第五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经典 472

第一节 《维摩诘经》的汉译及其基本内容 472

一、《维摩诘经》的汉译本 472

| | |
|-------------------------|-----|
| 二、《维摩诘经》经题的含义及其结构 | 478 |
| 三、《维摩诘经》的核心内容 | 486 |
| 1. 无住为本 | 486 |
| 2. 如来种 | 488 |
| 3. 不二法门 | 491 |
| 4. 唯心净土 | 493 |
| 第二节 《楞伽经》的汉译及其基本内容 | 496 |
| 一、《楞伽经》的汉译本 | 496 |
| 二、《楞伽经》经题的含义及其结构 | 499 |
| 三、《楞伽经》的唯识思想 | 504 |
| 1. 诸识生灭 | 504 |
| 2. 藏识境界 | 509 |
| 3. 五法差别 | 513 |
| 4. 就五法相辨三自性 | 516 |
| 5. 就阴界入辨二无我 | 517 |
| 四、《楞伽经》的如来藏思想 | 518 |
| 1. 立如来藏的因由 | 519 |
| 2. 五性差别 | 520 |
| 3. 别辨一阐提 | 523 |
| 4. 如来藏与八识 | 524 |
| 五、《楞伽经》的涅槃思想 | 527 |
| 1. 涅槃差别 | 527 |
| 2. 驳外道涅槃 | 529 |
| 3. 如来“非常非无常” | 530 |
| 第三节 《大乘起信论》的翻译及其基本内容 | 532 |
| 一、《大乘起信论》的翻译 | 532 |
| 1. 隋唐经录关于《大乘起信论》译者的记载考辨 | 533 |
| 2. 《大乘起信论序》的真伪 | 540 |
| 3. 转引《四论玄义》之说质疑 | 549 |
| 二、《大乘起信论》的结构 | 552 |
| 三、一心·二门·三大 | 554 |
| 四、本觉与本不觉 | 559 |
| 五、真如无明互熏与体用合一 | 564 |
| 人名索引 | 567 |

第一章 南北朝佛教与王朝世族

第一节 南北朝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东晋偏安一隅，定都建康（今南京），中国疆土分裂为南北两部分。420年，刘裕废东晋恭帝，建国号为宋，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南方先后经历宋、齐、梁、陈四朝共172年，史称南朝；而北方魏太武帝灭北凉，实现统一，后又分裂为东魏、西魏，此后又分别为北齐、北周取代，最后北周灭北齐，此统称北朝。581年，隋灭北周，又灭南朝陈和后梁，统一了全国。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战乱频仍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尖锐，加之战乱连年，终于导致南北分崩、经济残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局面，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看成是强盛的汉、唐之间的低谷。

一、南朝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南朝门阀制度下，世家大族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特权。政治上，世

家大族生而富贵，凭借世资，“平流进取，坐至公卿”^①。魏立九品铨序之法，已成高门操政之利器^②。而寒门子弟，求宦无门。士庶之隔，有如天壤，乃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南朝官职有清浊之分，有些官职如黄门侍郎，品级虽不高，却是清选，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充任，寒族则不能担当。国家法律亦偏袒世族，如宋、齐、梁三代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门）以过立（30岁以上的）试吏”^③的规定。世家大族倾向于担任高尚轻闲的文职，嫌憎事务繁重的实际公职。如“台郎”一职，为其所鄙；而秘书郎和著作佐郎，因职闲廩重，地望清美，多为世家子弟仕进之阶梯。为保持门第之高贵，世家大族除了“宦”有等级差别，“婚”亦相当谨慎。他们为避免“婚非所类”，或联姻帝室，或相互联姻。而语言、服饰，皆是门第之象征。优游的生活方式使世家大族虽位居高职，却不乐世事，“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④，成为高官厚位上的傀儡，“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⑤，日趋腐朽。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南朝寒素崛起。寒素活跃于南朝历史舞台，约始于宋齐，成于萧梁^⑥。他们出身低贱，然文通经术，武达军功，加之勤于庶务，勇于攀附，深得皇帝和贵族信赖，从而执掌机要。在中央，寒素频居“中书通事舍人”之职，此职地处枢要，直接受命于皇帝，人地虽寒，官品虽卑，而权任极重；在地方，寒素多被委任为“典签”，代替幼小的皇子处理政务，职务虽低，实权却大，“威行州郡，权重蕃君”^⑦。为能跻身特权阶层，这些暴贵者极力效仿世家大族的生活方式，或营建高宅大院，或努力附庸风雅，有的还冒注士族籍贯，甚至冀望联姻高门，但是门阀贵族

^{①⑤}《南齐书》卷二三《王俭传》论，第4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② 王伊同：《五朝门第》第3章，第28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③《梁书》卷一《武帝纪》，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④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涉务篇》，第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⑥ 参见章程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编，第556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⑦《南史》卷七七《吕文显传》，第19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却对他们的表现冷眼相待,轻视甚至漠视。因此掌权后的寒素,“他们的最高愿望不是打破这种士庶等级区别,相反的是想挤入士族行列,乞求承认,并且转而以之自傲,甚至同样坚持士庶区别观点”^①。结果是,寒素队伍越扩大,作为皇权统治基础的赋役征发对象越缩小;士庶之间的界限越模糊,国家土地所有制和门阀士族的特权的削弱和衰落越明显。但是寒素毕竟人数有限,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也有限,南朝世家大族仍然是政治权威,王朝的统治基础。

经济上,世家大族操纵经济命脉,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王仲荦先生指出:“他们这种政治地位的优越,未尝不是以他们庄园经济基础的优越为前提的。”^②自魏晋“九品官人法”实施以来,世家大族各依贵贱等级,广占山川湖泽。除在京城及近郊兴建庄园别墅,广营豪华宅院,他们还有历代荫封赏赐的领地,以致形成典型的“大土地所有”。世家大族依据土地零散分布、地形多变的区域特点,采取多元化经营,形成错落有致的田园景致,以满足他们游山玩水、舒适享乐的情趣;且庄园大规模地生产出各项农产品,在保证自给自足的前提下,又极大地满足了出售求利的需要。钱币成为南朝最为活跃的交换媒介,放高利贷更是有经济实力的士族乐于经营的产业。世家大族聚敛钱财,压榨人民,无疑加深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国家土地大量为世家大族、暴贵者以及寺院所侵占。与官品占田制及荫客制的特权相联系,南朝世家大族在经济上享有免除税役的特权,僧尼也享受免除徭役、不输租调的特权,“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③,故赋税征收成为“纵富督贫,避强侵弱”^④。各地百姓不堪苛捐重税,不惜自残躯命,斩绝手足,纷纷逃亡或出家。而南朝政府为防止民众

^①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第561—56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②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6章,第4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③ 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四《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2卷,第278页中。

^④ 《魏书》卷四《世祖纪》,第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逃亡以避役,采用“编户”方式,推行“吏民亡叛制”。吏民亡叛制即“什伍连坐制”,原本兵制,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方法是在闾里中编组什伍,以“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五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①,实行连坐治罪,目的是稳定户籍,禁止逃亡^②。逃入大土地所有者领地的赤贫者以及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小农,他们既要承担国家繁重的田租、户调等赋役,以及无条件的兵役;还要忍受特权阶层的欺压和盘剥。特权阶层拥有大批荫附人口,过着奢华生活,而国家户口衰耗严重,影响了政府赋役、力役征发,以及税收征入,也干扰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

文化上,南朝是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历史阶段。儒家的纲常名教仍然是巩固政权的正统思想,其中,孝亲观念得到极大张扬;民间道教经过葛洪、陆修静等的“清整”,其神仙学说在上层阶级获得流行;而佛教自东晋“玄佛合流”以后,以玄解佛、说佛证玄趋势明显,极大地推动了佛教融入本土文化。世家大族既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时代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本具有渊博的家学和独特的家风,积淀的文化底蕴是他们成为高门的基础,也是他们获得政治特权的资本。但频繁的政权更替和血腥的镇压杀戮,使他们畏惧陷入纷争漩涡,而以“止足”自警,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世家大族舞文弄墨,热衷山水游历和玄佛清谈,出现了由政治重心趋向于保持文化优势的转型。

就南朝佛教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帝王的大力扶持和贵族文人士大夫的虔心信奉,南朝佛教发展迅猛:义学师说兴起,专经专论研究,信奉者激增,寺院经济发达,僧团势力扩大。南朝奉佛的帝王不少,如宋文帝、宋明帝、梁武帝、简文帝等,都是有名的崇佛者。虽然帝王崇佛有其“坐致太平”的政治目的,然他们支持佛经翻译、礼敬供养僧人、组织编撰佛典类书、举办弘法大会的实际举措,起到促进佛典大量传译,以及佛教

^①《宋书》卷四〇《百官志》,第1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参见杜正胜《周代封建解体后的军政新秩序——编户齐民的研究之二》,第102—109页,史语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一分。

义理广泛传播的客观效果。皇室诸王中如刘宋的彭城王刘义康、萧齐的文惠太子萧长懋和竟陵王萧子良、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等，也是虔诚的信奉者。这些皇室贵胄或著述灵验故事、或抄写经文、或宣讲佛理，既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层面，又促使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学说普及朝野。另南朝后妃中信佛者亦众，兹不一一赘言。

南朝奉佛的主力军是世家大族及其子弟，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吴郡陆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吴国张氏等，自东晋以来信佛者就很多。他们长于玄学和佛理，交接高僧，崇尚清谈，使南朝佛教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北朝佛教的“玄学化”特色。这些世家大族子弟通晓佛理，知识面较广，积极参与辩论和注疏佛经，改变了早期对佛教“不辩其理之所在”^①的缺憾，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通，为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趋势奠定了思想基础。且理论的发展又促使他们虔诚信仰，从而对礼佛、斋僧、建寺、立像等修道实践更加热衷；他们还将佛理渗透到精神世界，注重落实佛教的现实精神，把信仰激发为对生命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思考，自觉地在社会生活中实践佛法的慈悲理念，完善心性，从而为最终形成有影响力的士大夫佛教铺就了阶梯。

南朝佛教涅槃学说盛行，与之而来的佛性问题，伴随神灭与否的争论，备受关注。这其中关涉众生有无佛性，不灭的灵魂是否就是“佛性”，众生如何成佛，成佛有无捷径，以及有无佛国净土等众多理论，但究其实质，则是人性问题的大探究：人是生而善还是生而恶，善心何来，人如何修养内心才能弃恶从善等等。辩论者结合儒家心性学说所进行的对“佛性”的探讨，促使儒释理论进一步交融；而道教模仿“佛性”大谈“道性”，也反映出文化融合的积极取向。南朝佛教义学发达，成为隋唐时期形成宗派佛教的滥觞。而无论是以传统文化来解说佛典，还是以佛典附会传统文化，这种相互交融，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此外,南朝佛教的快速发展,导致寺院激增,佛教势力扩张,从而不可避免地与世俗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因而出现了不少反佛、排佛言论,如刘宋时期丹阳尹萧摩之、周朗,梁武帝时的郭祖深、荀济都是著名代表。他们反佛、排佛的理由综合而言,集中在以下方面:反对僧人参政,以防患于未然;要求僧人致敬王者,维护王者尊严;限制建寺造像,节约国家资源;力主沙汰僧尼,整肃佛门清规;主张僧尼还俗务农,以增加政府赋税收入;掀起佛道、黑白、夷夏之争,指斥佛教与传统文化相违之处等。从总体上说,魏晋南北时期的儒释道关系,既有对立和斗争,又有交会与融合。但从发展趋势上看,“三教交融”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

二、北朝佛教的社会文化背景

北方建立魏国的鲜卑族原为漠北游牧民族,世代以射猎为生,崇尚勇武,民俗淳朴,文化简易。东汉初年,鲜卑人逐渐南迁。东晋淝水之战后,其拓跋部成为塞北主要势力。398年,鲜卑族的拓跋珪扫荡北方,建国号为魏,称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连年征战。在其定都前后,曾两次大规模徙民,强制山东六州民众大规模北上,此举不仅促进了南北民族大融合,而且将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传播至平城。

然武力的征服不代表人心的征服。鲜卑族在与汉族的接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两种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产生出“渐慕诸夏之风”的心理。为巩固政权,控制被统一的地区,道武帝采取联合汉族世家大族,利用儒学纲常名教的治国方针。他注重搜罗汉族优秀人才,“苟有微能,咸蒙叙用”^①,并令其制定官制、礼仪和律令。北方士族的领袖人物如清河崔宏、崔浩父子,赵郡李孝伯、李安世等,均得其重用。又置五经群书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两千余人,以振兴儒学。

^①《魏书》卷二《太祖纪》,第28页。

421年，明元帝拓跋嗣与南方刘裕的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这本该为南北交流打开通途，但不久刘裕驾崩，两国关系破裂，南北交流至此又被阻断。423年，拓跋焘即位，史称太武帝，他占领夏，灭掉北燕，降伏北凉，横扫整个华北。太武帝继续执行重用汉人政策，他征召儒者范阳卢玄、渤海高允等，又令州郡各举才学；并选拔儒学优长者为中书博士，教授鲜卑贵族，学习汉族文化。而北凉兴盛的佛教文化也通过战败被掳掠的僧众，进入平城。

471年，拓跋宏册立为皇帝，史称孝文帝。他推崇中原文化，于太和十八年（494）力排众议，迁都洛阳，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大兴儒学。并实行系列改革：禁止使用鲜卑语；改胡服为汉服；诏改拓跋复姓为元姓；定姓族品第，推行“以贵承贵，以贱袭贱”^①的门阀统治；禁止鲜卑同姓相婚，令鲜卑贵族与汉人著姓通婚；依汉族官僚机构厘定官制。这些无疑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也加深了拓跋部的矛盾。陈寅恪先生指出：“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②激烈的政治分裂冲突，削弱了北魏的强势。

北魏南迁洛阳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孝文帝向往“中夏正音”的重要因素。入主中原的鲜卑族在学习汉族先进的技术、多元的文化的同时，也承袭了其腐朽没落的门阀制度和享乐思想。孝文帝按照祖宗官位将郡姓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以皇室元氏门望最高，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鲜卑著姓，与北方汉族大族卢、崔、郑、王相当，并据此制定了清浊分明的官僚品第。鲜卑族的贵族大姓享受特权的同时，其生活也日益奢侈、放荡和堕落。故王夫之批评北魏统治者：“自迁洛以

^①《魏书》卷六〇《韩麒麟传》，第1343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